

翻译美学视阈下文学意象的审美变形与接受度关联性探究

战昕彤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4日

摘要

在翻译美学视阈下, 接受度理论为文学意象审美变形的研究提供了动态分析框架。该理论源于接受美学, 强调读者在意义生成中的主动性, 认为翻译价值取决于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效果。其核心在于“期待视野”与“审美距离”的互动: 适度距离可激发解读兴趣, 过度则导致理解障碍。实践中, 翻译策略的选择需兼顾语言准确性与文化适配性, 对文化专有项应采用“异化 + 补偿”策略, 以符合读者认知模式。方法论上, 可以构建“文本 - 读者 - 语境”三维框架, 通过分析意象的审美维度、目标群体的文化认知及社会语境, 来指导并调整翻译策略。

关键词

翻译美学, 文学意象, 审美变形, 接受度理论, 关联性

Correlation Research on Aesthetic Deformation of Literary Images and Reception Theory in Translation Aesthetics

Xintong Zh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Received: July 13, 2026; accepted: August 10, 2026; published: August 24, 2026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reception theory provides a dynamic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search on aesthetic deformation of literary images. Originating from reception

aesthetics, this theory highlights readers' initiative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holds that the value of translation hinges on the reception effect among target-language readers. Its core li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and "aesthetic distance": a moderate distance can stimulate readers' interpretive interest, while an excessive one will give rise to comprehension barrier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hould balance linguistic accuracy and cultural adaptability. For culture-specific items, the strategy of "foreignization plus compensation" ought to be adopted to conform to readers' cognitive patterns. Methodologically, a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text-reader-context" can be established. By analyzing the aesthetic dimensions of images, the cultural cognition of target groups and social contexts, translators are able to guide and adjus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ly.

Keywords

Translation Aesthetics, Literary Images, Aesthetic Deformation, Reception Theory, Corre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绪论

翻译美学作为一门融合翻译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其核心在于通过审美视角重构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研究翻译美的艺术本质、艺术特征[1]。立足翻译美学视阈，对文学意象的审美变形与接受度关联性展开系统性研究，不仅可以深化翻译理论中审美维度的构建，也可跨文化文学传播提供可操作的实践框架。

国外对于翻译美学较早的系统性研究著作是由 Shirley Chew 与 Alistair Stead 编撰的 *Translating Life: Studies in Transpositional Aesthetics* [2]。全书以对翻译过程的恰当探析为脉络，梳理了自文艺复兴至今的各类研究议题。书中系统剖析了创造性转译(creative transposition)的理论内核、运作机制与深层价值；同时规范了翻译审美主义(aestheticism in translation)等翻译美学的概念。Harriet Hulme 在 *Ethics and Aesthetics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分析三位欧洲双语作家作品中蕴含的伦理与政治思想，认为翻译美学在于翻译兼具创造性与批判性的巨大价值得以显现[3]。Azzeddine Bouhassoun 认为翻译美学与其他多个文化研究方面的美学交织在一起，在促进文化接触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总体而言，国外研究聚焦翻译美学的理论建构、审美转译机制与跨文化功能，但较少将文学意象的审美变形与读者接受度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针对二者的双向互动关系缺少专门、系统的实证与理论探讨。

国内翻译美学的研究成果较之国外更加丰富多元。刘宓庆提出应该建立比较系统的美学理论，强调翻译美学在翻译理论研究中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随后在《翻译美学导论》一书中构建现代翻译美学的基本框架，提出了翻译不同文体的诸多标准与相对应的翻译策略[5]。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作为翻译美学专著，对翻译美学的诸多研究对象分别进行详细探讨，分析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6]。李莹莹与陈方方引入格式塔理论，将翻译美学与审美心理学相结合，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及文学翻译中的语言模糊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7]。近年来，国内对翻译美学的研究视角日趋精细化，延伸至诗歌、小说、影视等文体的审美翻译阐释，但现有成果仍存在缺口：多数研究或侧重翻译美学理论本身，或单独探讨意象翻译、读者接受。目前在翻译美学视阈下，少有研究将文学意象审美变形与读者接受度理论二者进行有机整合，缺乏对“审美变形如何影响接受度、读者接受又如何反哺审美选择”的动态关联研究。

综上,当前翻译美学研究虽成果丰硕,但尚未形成完善的“翻译美学-意象审美变形-读者接受度”三位一体的研究体系,对文学意象跨文化译介中的审美重构与接受反馈的双向机制缺乏深入阐释。基于此,本文以翻译美学为研究视阈,融合接受度理论,对文学意象的审美变形类型分析,构建“文本-读者-语境”三维动态分析框架,系统探究审美变形与读者接受度的双向互动关系。本研究致力于弥补现有研究中“审美变形-接受度”关联分析的不足之处,完善翻译美学在文学意象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论研究链条。同时为跨文化文学译介提供可参照的审美选择与接受预判路径,丰富翻译美学体系中文学意象译介的研究内容。

2. 翻译美学视阈下的审美变形理论与接受度理论

2.1. 翻译美学中的审美价值与审美变形

翻译美学领域的研究不仅关注语言符号的转换,更强调在跨文化语境中实现审美价值的等效传递。翻译美学以审美主体,即译者,对源语与目的语文本的审美感知为出发点,通过分析语言形式、文化意象、情感表达等要素的审美特性,构建起连接不同文化审美系统的桥梁。其研究范围涵盖翻译过程中的审美选择、审美创造与审美接受三个维度,尤其注重在语言转换中保持或重构原文的审美张力。在文学翻译领域,审美特性表现为三个层面的互动。首先,语言符号的审美性体现在音韵、节奏、修辞等形式的艺术加工中,例如诗歌翻译中通过韵律重构实现音乐美的传递。其次,文化意象的审美性涉及象征系统的跨文化转译,如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在英语文化中的等效再现。最后,情感表达的审美性要求译者捕捉原文的情感基调,并通过目的语来实现情感强度的精准调控。这种审美特性显示,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审美价值的再创造过程。

翻译美学的理论框架建立在两个理论之上:其一为审美等效原则,强调在目的语中重建与原文相当的审美效果;其二为审美距离理论,主张通过适度变形实现跨文化审美共鸣。审美等效并非机械对应,而是要求译者在语言形式、文化内涵、情感表达三个层面实现动态平衡。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在翻译中国古诗时创造的“意象并置(Juxtaposition)”手法,就是通过打破英语语法常规实现了原文的视觉审美效果。审美距离理论则解释了为何完全直译往往导致审美失效——当文化差异过大时,保留原文形式反而会破坏目的语读者的审美体验。这种情况下,译者需要通过变形调整意象的呈现方式,使其符合目标文化的审美预期。翻译美学视阈下的文学意象研究,本质上是对跨文化审美沟通规律的探索。它要求译者既作为审美主体进行创造性转化,又作为文化中介实现审美价值的等效传递。这种双重角色决定了审美变形不是任意地改写,而是在审美原则指导下,通过语言策略的调整实现文化意象的审美再生。

2.2. 翻译美学与接受度理论研究

在翻译美学视阈下探讨文学意象的审美变形与接受度关联性时,接受度理论作为理解读者反应与文本意义生成的关键框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接受度理论源于20世纪中叶的接受美学运动,以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为主要代表,旨在突破传统文学批评中“作者中心论”与“文本中心论”的局限,强调读者在文学意义构建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概念,是指读者在阅读之前的一种潜在的对作品意义的期待[8],认为读者基于个人经验、文化背景和审美偏好形成对文本的预设期待,而文本通过打破或满足这些期待实现意义的动态生成。此后,伊瑟尔进一步提出“隐含的读者”、“空白”与“否定”理论,指出文本预先结构了接受者的角色并期待其出现,迫使读者去把握文本。这一理论转向标志着文学研究从生产视角向接受视角的范式变革,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读者导向的分析工具。

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层面,首先,接受度理论为评估译本质量提供了读者反应导向的评判标准。接

受度理论强调读者在文学作品接受过程中的地位,基于此,译本的美学要能被读者感受接纳[9]。传统翻译批评往往聚焦于“忠实性”与“等效性”,而接受度理论则强调译本是否在目标语文化中激活了与源语读者相似的审美体验。其次,接受度理论为翻译中的审美变形提供了动态平衡的依据。译者需在“保留源语意象特色”与“适应目标语审美习惯”之间寻找最优解。这种变形并非对源语的背离,而是通过重构意象的接受语境实现了跨文化审美等值。同时,接受度理论还揭示了翻译批评的局限性——单纯以源语规范评判译本可能忽视目标语读者的实际接受效果。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提出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与接受度理论形成互补,强调译本功能(如信息传递、审美感染)应优先于形式对应,这为处理文学意象的审美变形提供了更灵活的伦理框架。

因此,接受度理论通过揭示读者在意义生成中的核心作用,为翻译美学视阈下的文学意象研究提供了动态的、读者导向的分析范式。其发展历程中的范式转型与核心观点中的互动性、历史性、个体差异性,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理解,更为实践中的审美变形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视角的引入,使翻译研究从静态的文本对比转向动态的意义协商,为文学意象的跨文化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

3. 审美意象变形与接受度理论相关度研究方法的构建

3.1. 文学意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

在翻译美学的广阔视阈下,文学意象是文化遗产与艺术表达的核心要素。可以说,意象是艺术的一部分,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感寄托[10]。文学意象,作为文学作品中承载情感、思想与文化信息的符号系统,其本质在于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激发读者内心的审美体验与文化共鸣。然而,当这些意象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边界时,其原有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往往会发生微妙的变形,这种变形不仅关乎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涉及文化认知、审美习惯及心理接受度的深层次调整。

文学意象的审美变形与接受度之间的关联性,还体现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性与创造性上。译者需权衡不同文化背景下意象的联想效果和相应的使用规律,在保持原作基本特征的同时,兼顾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认知与审美习惯[11]。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译者基于对原作文化内涵、审美风格及目标语读者期待的理解,进行的再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需要平衡忠实性与创造性,既要尽可能保留原作的意象特色与文化信息,又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审美习惯与接受能力。同时,通过调整句式结构、韵律节奏等语言手段,使译文在保持原有意象美感的同时,更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

文学意象的审美变形并非全然负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它集合了艺术性与思想性,具有跨越语言界限的独特魅力,涉及文化认知和情感共鸣[12]。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通过翻译作品接触并理解异国文学意象时,他们不仅获得了新的审美体验,也增进了对不同文化的认识与尊重。这种跨文化的审美对话,有助于打破文化壁垒,促进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发展。

3.2. 审美变形机制的动态构建

如何进行意象美的处理是构建审美变形机制的关键之一,因为它既是文化差异的集中体现,也是审美变形的主要研究对象。在翻译过程中,对意象的处理自然离不开审美变形。构建动态平衡下的审美变形机制,既是满足目标读者文化情感预期的因素之一,也是恰当传达源语情绪与文化特色的关键道路,同时更是提升接受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此,明确审美变形的概念与内涵,把握审美机制的动态平衡发展点,深入探索审美变形机制与接受度之间的关联性与影响因素,可为进一步发展跨文化文学传播提供更科学、更牢固的发展基础。

在翻译美学视阈下,文学意象的审美变形作为跨文化传播中的突出现象,需要译者基于源语与目标语审美体系的差异,通过创造性重构实现意象审美价值的再创造。这一过程既非简单的语言转换,亦非

主观臆断的随意改写，而是遵循美学原则的动态平衡。审美变形在翻译过程中，可看作是因语言结构、文化语境、审美习惯的差异，使得源语意象在目标语中的形式、内涵或情感发生系统性偏移，但最终呈现的审美效果仍与原文保持功能对等。根据变形维度，审美变形可划分为形式变形、内涵变形与功能变形三类：形式变形聚焦语言符号的重组，如韵律、节奏的调整；内涵变形涉及文化意象的语义转换，如隐喻、象征的再阐释；功能变形则关注意象在叙事结构中的角色重构，如主题意象的强化或弱化。三类变形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呈现交互作用，共同构成审美变形的完整谱系。

译者的审美选择实际上是文化立场与翻译目的之间的博弈。审美变形的成因还可追溯至翻译主体的认知模式。译者作为跨文化媒介，其审美偏好、文化素养和翻译策略直接影响意象的重构。许渊冲在翻译唐诗时，倡导“三美”原则(意美、音美、形美)，强调通过韵律、对仗等手段再现原作的审美特质。而尤金·奈达(Eugene 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则更关注目标读者的反应，主张用最贴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信息。两种理念在实践中的碰撞，凸显了审美变形中主体性的作用。从理论视角看，审美变形符合接受美学的“视野融合”原则，即译者作为双重读者，需在源语审美视野与目标语审美视野间构建对话空间。变形不是单向的妥协，而是双向的创造。源语意象通过变形获得新的审美生命，目标语文化因异质意象的融入实现审美扩容。因此，从语言结构的重组到文化语义的对接，再到审美功能的适配，变形过程始终围绕“等效审美”展开。

3.3. “文本 - 读者 - 语境”三维分析框架的构建

在翻译美学视阈下探讨文学意象的审美变形与接受度关联性时，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动态视角，也突破了传统静态文本分析的局限，将翻译质量评估从“等效性”转向“功能性”，关注译文能否在目标文化中实现预期的审美与交际效果，即“要考虑到大众的理解能力，要更加注意交流，要畅通地交流”[13]。

接受度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期待视野”与“审美距离”的互动。读者基于自身文化背景形成的期待视野，影响了其对翻译文本的接受阈值。当译文意象与读者预期存在适度审美距离时，可激发解读兴趣；若距离过大，则可能导致理解障碍或文化隔阂。因此，翻译策略需根据意象类型调整：对于文化专有项，可采用“异化 + 补偿”策略；对于普适性意象，则可优先选择“归化”手法。文学意象的审美变形，不是文本内部的自足事件，而是在翻译、传播与接受的往复运动中生成的意义现象。传统翻译理论对意象的关注往往聚焦于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二元对照，以“忠实”为标尺衡量变形得失。然而，接受度理论与接受美学的兴起打破了这一迷思。作品的意义实现还要有读者的阅读参与；读者的接受程度关系到翻译的价值。这意味着，意象的审美变形不是需要被消除的误差，而是需要提升读者接受度后获得理解和认可的现象。

提高作品接受度的方法论可依托“文本 - 读者 - 语境”三维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雏形来源于陈大亮在《文学翻译的境界：译意·译境·译味》提出的相关理论。他认为在文学翻译中，“意味与意境也同样离不开译者，文本与读者三个方面”[14]。译者造境、读者填境、翻译语境，正对应文本、读者、语境三个方面。文学作品的意味与意境，恰恰存在于文本表现、读者接受、语境创造三个不可分割的阶段之中。以上三者共同形成的分析框架，建立在承认文学翻译是再创造的艺术这一基础上，也印证了“文学意象的审美变形”与“接受美学及读者反映论”共同体现了文学作品的创造意图。

“文本 - 读者 - 语境”三维框架的优势在于避免过度依赖“文本中心”的封闭性和过分强调“读者中心”的相对主义。文本提供审美变形的“物质基础”——哪些意象和要素发生变化、怎样发生变化；读者提供审美效果的“经验证据”——变形的结果如何被感知、评价与接受；语境提供审美变形的“发生阐释”——为什么变化、变化的条件是什么。这三个维度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构成一个动态循环。

简言之：语境塑造文本，文本触发读者，读者的接受反馈又反过来改变下一次翻译的语境预设。三者相结合，构成的是一种分析框架而不是一套机械的操作步骤。其目的不是要给每一种意象翻译都给出精确的参考标准，而是为研究者和译者提供思考和选择的方向。在翻译过程中做出审美变形这一决策时，译者能有意识地去思考这些彼此关联的维度，从而将决策的采纳与使用建立在比个人直觉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而通过这一三维框架，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翻译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缝隙，让抽象的美学讨论有机会下沉到具体的文本操作层面，也让经验层面的翻译技巧有机会得到理论层面的反思与提升。

4. 翻译美学视阈下审美变形与接受度关联性的案例分析

4.1. 审美变形因素影响下的案例分析

审美变形的发生机制源于语言、文化与审美三重维度的张力。语言层面，不同语系的语法结构、词汇系统差异会造成形式变形。比如，汉语常体现出四字格的节奏美，而英语需通过头韵、半韵等手段重构音韵效果。如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句的叠词结构，林语堂将其翻译为“*So dim, so dark, / So dense, so dull, / So damp, so dank, / So dead!*”^[15]，通过头韵(forlorn)与元音重复(so desolate/so dreary)模拟原作的音韵层次。文化层面，文化意象的“不可译性”迫使译者进行内涵变形。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雁”意象，承载归乡、传信等多重文化内涵，而英语文化中“wild goose”则更倾向于展现野性或自由，译者需通过增译、注释或替代意象实现文化语义的对接。审美层面，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期待驱动功能变形。中国古典诗学追求“以物观物”，诗人常隐去主体，让情感化入景物。而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则更崇尚诗人主观情感的强烈投射，“以我观物”，呈现出一种主客分明的情感张力。以王维的《鹿柴》为例，“*There seems to be no one on the empty mountain... / And yet I think I hear a voice, / Where sunlight, entering a grove, / Shines back to me from the green moss*”^[16]。通过强化“我”之主体性，使得原诗的诗性与神韵增添了更多西方特性。

语言差异对审美变形的影响体现在符号系统的非等值性上。以汉语“梅花”意象为例，其在源语中承载着“高洁”“坚韧”的文化隐喻；但翻译为英语时，若直接译为“plum blossom”，目标语读者可能仅获取其植物学特征，而无法激活与“孤傲”“清冷”相关的审美联想。这种符号意义的损耗源于英汉语言中植物意象的文化编码差异：英语文化中“rose”更常与爱情、激情关联；而“plum blossom”却缺乏相对应的文化积淀。进一步分析，语言差异还表现为句法结构对意象表现力的制约。汉语作为意合语言，常通过意象的并置与叠加营造意境，如“枯藤老树昏鸦”以三个名词短语勾勒出萧瑟图景；而英语作为一种形合语言，需依赖介词、连词等显性连接手段，这可能导致意象的流动性被打破，审美张力被稀释。

目标读者群体的文化预期则是审美变形的另一关键变量，指读者基于自身文化背景对文学意象的预设认知，并直接影响读者对翻译文本的接受度。以“龙”意象为例：在中国文化中，“龙”是吉祥、权力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常与邪恶、恐怖关联。若将“望子成龙”直译为“*hope one's son becomes a dragon*”，目标语读者可能产生负面联想，违背原作的祝福意图。因此，译者常采用文化替代策略，如译为“*hope one's son becomes a success*”，通过牺牲部分意象的独特性来符合目标读者的文化预期。这种调整反映了翻译中的“接受美学”原则，即译文需以读者的审美体验为归宿。然而，文化预期并非静态，而是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演变。比如，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部分西方读者对“龙”的认知逐渐转为中性甚至积极，这为译者提供了新的选择空间：在儿童文学中保留“dragon”并辅以注释，或在特定语境下采用音译“loong”并解释其文化内涵。这种动态调整体现了译者对目标读者文化预期的敏锐把握。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揭示了审美变形的复杂性。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为例，

其中“冷香丸”的翻译体现了语言与文化的双重挑战。“冷香丸”是薛宝钗服用的药丸，其配方包含四季白花蕊、特定节气的雨水等，象征“清冷克制”的审美特质。若翻译为“a pill made of white flower petals collected in four seasons and rainwater from the Rain Water solar term”，则过于冗长，破坏了原作的简洁美。译者采用“Cold Fragrance Pill”[17]，保留“冷香丸”的关键特质，在可读性与文化保真间寻求平衡。这一例子表明，审美变形并非单向的损耗，而是通过译者的创造性重构实现审美价值的跨文化传递。可见，语言差异通过符号系统的非等值性和句法结构的制约性，直接导致意象的形态与内涵发生变化；文化预期作为读者接受的关键变量，要求译者在保真与可读之间权衡；译者主体性则通过审美偏好和翻译策略，决定意象重构的方向。成功翻译的关键在于平衡意象的审美变形与读者的认知惯性，既避免过度异化导致的文化折扣，又防止过度归化造成的审美稀释。

4.2. “文本 - 读者 - 语境”三维分析框架影响下的案例分析

“文本 - 读者 - 语境”三维分析框架这一研究方法的特点在于注重“文本表现、读者接受、语境创造”三个部分的独立性与协同性。分析相关案例可得出文本、读者、语境三个部分的不同特性，以及对于翻译美学研究产生的不同影响。

文本分析关注意象在语言转化过程中审美质素的保留、迁移与重构，聚焦意象的审美维度，包括感官特征、情感指向及文化符号功能。从感官特征层面分析文本可知，意象诉诸视觉、听觉、触觉等身体性审美经验，关注翻译中色彩、音韵、形貌的具体质感是否得以保存，如“雨丝风片”的轻细柔缓若译为“rain drops with breeze”，则丧失了听觉的美感和触肤的质感。从情感指向层面分析的是意象承载的特定复杂情感特色。如艾青笔下“土地”的苦难与眷恋交织，翻译中极易被简化为单一声部。文化符号层面突出文本中意象的凝缩功能，比如集体记忆、伦理价值或认知图式。如“悠然见南山”中的“南山”，是中国古代文人向往隐逸、追求自然精神符号。但在英语环境中，“South Mountain”并无此种含义，更倾向于方位地貌的客观指称。文本维度的分析，正是追踪这三者在翻译中如何分离、重组或流失。

读者分析需结合目标语群体的文化认知模式。读者维度将分析重心从“文本有什么”转向“读者感受到什么”。在阅读时，读者对语境范畴和文本框架的印象建构是“即时”的，同一个意象，在不同读者群体中引发的审美反应可能存在本质差异。此外，翻译时要充分考量目的语读者的接受习惯，译文要贴合读者审美与阅读范式。英语读者更依赖逻辑连贯性，而汉语读者则更适应意象的跳跃性，因此翻译时可适当调整语序或将源语特有词汇改换为同义或近义的目的语词汇。葛浩文在翻译苏童的小说《米》时，大量运用归化策略，贴合西方读者的定向期待。如将源语文本中的“说到伤口上”翻译为“touched a nerve”[18]，便于读者理解其含义，且避免读者误认为是小说人物身体上受伤。同时葛浩文的翻译还结合异化手法，保留原意象的东方特色，满足读者审视异域文化的创新期待。

语境分析需考虑社会文化环境。意象的审美变形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源语语境与目的语语境之间的差异。在源语语境中不言自明的东西，移植到目的语语境后可能变得不可理解；在源语语境中具有美好联想意义的意象，在目的语语境中可能截然不同。然而，语境不是静态的背景板，而是动态的建构过程。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翻译《红楼梦》时，在“杏花村”一处特意补入杜牧原诗译文[19]，正是因为他预判英语语境中缺乏“借问酒家何处有”的相关文化知识，若不作语境补偿，贾政“还少一个酒幌”的笑谈便失去理解支点。这一案例生动说明：语境的分析任务，不是简单标示文化差异，而是揭示译者如何在差异中建构理解的条件。

5. 结语

本文立足于翻译美学相关理论，结合现有翻译美学研究中，审美意象变形和读者接受反应的关联程度仍有待进一步紧密结合空间这一研究现状，搭建起“文本 - 读者 - 语境”三维动态分析框架，希望能

借此建立起内在关联机制,更系统厘清文学意象跨文化转换过程中审美变形的生成逻辑与分类维度。文学意象翻译中的审美变形是一种客观现象。译者在翻译时,可以统筹文本原生审美特质、目标受众认知水平、当下跨文化传播语境,让审美变形能够兼顾源语文化与目标语审美共鸣,体现翻译美学追求的动态审美平衡。若忽视相关要素的影响,则有可能会造成意象审美价值损耗,削弱译文整体接受效果。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局限之处。首先是研究选取的分析案例集中于中英文学翻译,研究尚未纳入小语种互译等更多翻译样本,在不同语系、不同文化圈层翻译场景中的适配性仍有待更多样本验证,“文本-读者-语境”三维框架研究方法的论证存在一定局限。其次,全文以文本思辨分析为主,针对适度审美距离这一概念的定位与划分仍存在进一步细化的空间。同时研究聚焦文学文本中散文、诗歌两类文学体裁的意象翻译;在有关网络文学、影视字幕、文旅外宣等应用型文学文本的翻译场景下,未能充分展开分析三维框架的逻辑调整与应用路径。

基于现有研究局限,未来可从多维度延伸拓展本研究的分析体系,进一步深化翻译美学视阈下审美变形与接受度理论的交叉研究。首先可开展跨语种、跨文化圈层对比研究,分析不同文化体系下文学意象审美变形的差异化规律,不断完善三维分析框架的适配边界。同时可拓宽文本研究范畴,将网络文学、影视剧译制、对外文化宣传文本纳入分析对象,探讨三维框架在应用型翻译场景下的调整方式,丰富框架的实践应用场景。还可结合时代发展,考察机器翻译、AI文学翻译生成的意象文本中的自动化审美变形,依托三维框架对接数字时代翻译发展需求。最后可细化读者分层研究,划分多维度读者群体,探究不同变量如何塑造差异化期待视野,阐释审美变形对不同细分群体接受度的差异化影响,进一步细化审美变形尺度的动态调控方案。

综上所述,翻译学界侧重语言转换的等效性、美学界强调意象的审美价值、传播学更关注受众的接受效果,因此,构建三者间有效的对话机制,需要将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理论、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整合”理论及传播学中的“创新扩散”模型进行有机整合。未来的突破不仅需要技术手段层面的革新,更需要研究者保持对文化差异的敬畏之心,在审美变形与接受度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点。这样方能构建起真正具有全球解释力的翻译美学理论,为人类文明的互鉴共存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基金项目

中国民航大学2025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翻译美学视阈下文学意象的审美变形与接受度关联性探究”(2025YJSKC1002)建设成果。

参考文献

- [1] 刘宓庆. 翻译美学概述[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1986(2): 48-53.
- [2] Chew, S. and Stead, A. (2000) *Translating Life: Studies in Transpositional Aesthetics*.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3] Hulme, H. (2018) *Ethics and Aesthetics of Translation*. UCL Press.
- [4] Bouhassoun, A. (2017)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AL-MUTARJIM*, 33, 83-110. <https://doi.org/10.46314/1704-017-001-015>
- [5] 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 [6] 傅仲选. 实用翻译美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
- [7] 李莹莹, 陈方方. 格式塔理论与我国翻译研究述评[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4(2): 120-123.
- [8] 仇蓓玲, 陈桦. 读者期待视野与译者翻译策略[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6): 8-11.
- [9] 刘朝晖. 评《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可接受性——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生的抽样调查为例[J]. 中国翻译, 2014, 35(1): 82-87.
- [10] 韩云霞. 翻译美学视阈下的文学翻译审美再现策略[J]. 教育现代化, 2018, 5(34): 154-155.

-
- [11] 胡杨.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与语言表现[J]. 中原文学, 2025(12): 132-134.
- [12] 王琴芳. 汉英文学作品翻译中的意象再现技巧[J]. 汉字文化, 2025(10): 170-172.
- [13] 尹佳. 从读者接受理论看外宣翻译中的读者关照——黄友义、徐明强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16, 37(5): 76-80.
- [14] 陈大亮. 文学翻译的境界: 译意·译境·译味[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15] (战国)庄子, 等, 著. 扬州瘦马: 汉英对照[M]. 林语堂, 译.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 [16] Weinberger, E. and Octavio, P. (1987) *Nineteen Ways of Looking at Wang Wei: How a Chinese Poem Is Translated*. Asphodel Press.
- [17] Cao, X.Q. (1994)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Volume I*. Yang, H.Y., Trans.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18] Su, T. (1995) *Rice*. Goldblatt, H., Trans. Penguin Books USA Inc.
- [19] Hawkes, D. (1973) *The Story of the Stone*. Penguin Books Ltd.